

## 商業化視境中的女作家

— 以丁玲為代表 —

李 惠 敏\*

<目次>

I. 石破天驚式的出場

II. “丁玲失蹤”引發的“丁玲熱”

在現代作家中，與男性作家龐大的隊伍相比，女性作家的數量則要少得可憐，屈指可數。然也正是由於女性作家屬於“萬綠叢中一點紅”，在文壇上屬於稀缺資源，是鳳毛麟角，自然也就“物以希為貴”，在文學市場中格外搶手，甚至奇貨可居，自然也會吸引出版商基於商業利益來大力加以捧抬，達到名利雙收的目的。冰心在“五四”時期的成名，首先得益於當時女作家“稀少”的大環境。“在文壇上能提筆寫點文章的女子本已很少，至其能成為‘作家’者，則尤寥寥可數”<sup>1)</sup>的大背景下，冰心在文壇的出現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大家都不免對之有一種神秘似的發狂的崇拜。”<sup>2)</sup> 後來再經過《小說月報》對她刻意的商業包裝和宣傳，從而使她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作家，並有幸成為全國第一位知名的女作家。沉櫻在文壇嶄露頭角之後，由於女作家人數稀少，而市場需求相當旺盛，因此她簡直有些應接不暇，她的小說都是編輯約稿，沒有一篇是自己投稿投中的，甚至可以說她的小說大都是編輯催逼下寫

\* 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授，慶北大學校 招聘教授

1) 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3頁，光華書局 1933年1月。

2) 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89頁，光華書局 1933年1月。

出來的。應該說沉櫻的經歷是有代表性的，體現了女作家在文壇的境遇。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丁玲身上，雖然丁玲執筆為文的時間要后于丈夫胡也頻，但當二人共同到上海文壇闖蕩時境遇却明顯不同：“雜誌上要文章時，常有人問丁玲要，却不向海軍學生要。兩人共同把文稿寄到某處時，有時海軍學生的便被單獨退還。兩人共同把文稿版權售給某書店時，署海軍學生的名不成，署丁玲的名却又毫無困難的出版了。”<sup>3)</sup>原因很簡單，因為丁玲是女作家，更為期刊和書店看好。

女作家因其獨特的身份在文壇格外顯眼，倍受讀者關注；同時，女作家的創作也因其獨特的風致而展示出別樣的風景，吸引讀者——不論是男讀者還是女讀者——駐足觀賞，獨領風騷。“因為女子的內心生活和社會生活究竟和男子不同；她們所描寫的對象，每為男子所難想像到的。所以她們的作品實在可以代表另一種為男子所十分隔閡的生活。”<sup>4)</sup>正是女性作家創作所展示的“為男子所十分隔閡的生活”，在吸引女性讀者的同時，還能格外吸引男性讀者的注意，引發男性讀者的興致，加之女性作家的性別優勢，作家，作品的雙重優勢使女性作家較之男性作家無疑在社會上要更為搶眼，能更多吸引媒體和受眾的關注，在同等的情況下自然更易于獲得成功。在此背景下，“女作家”“女作家作品”仿佛就是一個金字招牌，既是出版商招徠生意的幌子，同時也是女作家文壇登龍的終南捷徑。<sup>5)</sup>雖然有的女作家並不買這個帳，但這絲毫不能改變讀者，編者，論者，出版者的印象<sup>6)</sup>。不僅如此，在這個男人占主導

3) 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第78頁。

4) 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第3頁，光華書局 1933年1月。

5) 曾朴主編的《真善美》雜誌曾在 1929年2月出版“女作家專號”，大獲成功；於是 1929年9月又有張若谷主編的《女作家雜誌》創刊，在上海甚至還出現了女子書店，“專以發表女子著作，供給女子讀物為職志”，該書店還于 1933年3月8日創刊了《女子月刊》。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女作家作品集，如《女作家小品選》，《女作家隨筆選》，《女作家散文選》，《女作家日記選》，《女作家書信選》等。

6) 丁玲很討厭別人稱她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雜誌為“女作家號”登門

地位的社會，基于人性的弱點，男人對於女人自然多一些欣賞，呵護，寬容甚至是放任，于是，當女作家在男作家，男編輯，男老板間游走時，享受到特殊待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難怪章克標在《文壇登龍術》中發出這樣的議論：“一個女人的想做文人，有了異性朋友，已盡夠了，別的簡直可以全部省略的，因為一切事他們都肯來代勞，即如要抄寫文章，自然有人願意做義務書記，要規劃事業，也有不要支薪的秘書，要宣傳，便有許多肯來搖旗吶喊，在報章雜誌上做文章捧場，更是他們的天職而自認為光榮的。”<sup>7)</sup> 話說得也許有些言過其實，但基本符合實情。

新文學發展到第二個十年，在個性解放影響下從家庭中掙脫出來的女性逐步增多，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也得到了明顯提高，同時，期刊出版業的發達也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揮灑空間，因此，三十年代女作家的人數較之“五四”時期有了明顯的增加，連吳曙天，吳似鴻，陸小曼，高君箴，問鵲等都夫貴妻榮，成為“作家”<sup>8)</sup>。女作家的紛紛出現也為出版商提供了商機，1929年2月，曾朴的《真美善》雜誌約請張若谷編輯了《一周年紀念號外——女作家專號》，發表了冰心，廬隱，陳學昭，蘇雪林，白薇，吳曙天等20多位女作家的作品和文章，出版後大獲成功。見有利可圖，1932年4月，女子書店在上海開業，“專以發表女子著作，供給女子讀物為職志”，并于次年3月8日創刊《女子月刊》；邵洵美的金屋書店也不甘人後，1929年9月創辦《女作家雜誌》季刊，特意延請張若谷主編。為了延續“女作家專號”的輝煌，他們在報紙上大做廣告，聲稱“張若谷先生編輯，內容專載中外女作家之文藝創作，亦有作家生活，女性文庫，文壇珍文，習作選粹，讀者懸賞各欄，每周五

求稿時，她大叫着“我賣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編輯拒之門外。但讀者和論者還是津津樂道地把她作為女作家來看，并突出強調其作品中顯示的女性心理。

7) 章克標：《文壇登龍術》，《章克標文集》(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493頁。

8) 1930年12月1日《讀書月刊》第1卷第2期“文壇消息”(十五)《夫婦作家》中言道：“中國文壇上的夫婦作家甚多，現在據調查到的有丁玲與胡也頻，沉櫻與馬彥祥，白薇與楊騷，郭林鳳與葉靈鳳，馮沅君與陸侃如，吳似鴻與蔣光慈，問鵲與張競生，(現在離婚)吳曙天與章衣萍，馮鏗與許峨，陸小曼與徐志摩，謝冰瑩與符，凌叔華與陳西滢等。”

万余言，圖文并重，材料新穎，趣味濃郁，愛好文藝者咸宜人手一冊”<sup>9)</sup>，意欲蒙騙作家和讀者，使人以為《女作家雜誌》即是昔日之“女作家專号”，最終招致女作家的反感和聯合抵制，蘇雪林，袁昌英，白薇等聯合在《申報》上刊發啓事，指出該雜誌与己“无涉”<sup>10)</sup>，正是在女作家的聯合抵制下，《女作家雜誌》未能重現“女作家專号”的輝煌。《女作家雜誌》雖然未能走俏，但迎合市場的需要，挂着“女作家”旗号的各种作品集和評論集在坊間還是紛紛推出，帶動了女作家創作的繁榮，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張立英編的女作家叢刊<sup>11)</sup>，黃英(阿英)的評論集《現代中國女作家》以及黃人影(阿英)編的《當代中國女作家論》等。

在三十年代，女作家丁玲的出現絕對是當時文壇一个十分重要而突出的現象，一方面因其作品的獨特个性而顯現出的獨特魅力，另一方面也因其“失蹤”，在比較長的時間里，一直吸引着人們關注的目光，并引發“丁玲熱”。

## I. 石破天惊式的出場

丁玲在三十年代文壇的出現可謂應時而出。當新文學發展進入第二个十年后，以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為代表的“五四”女作家的創作已顯疲態，甚至可以說進入了停滯期。時代的步伐已經跨越冰心所代表的表現“母親或夫婦的愛”的時代，隨后又跨越了馮沅君所代表的“母親的愛与情人的愛互相冲突的時代”，進入丁玲的時代。此時，愛“是家常便飯似的大講特講的時代”，時代的發展要求作家對愛有更進一層的表现，“要求較為深刻的純粹的愛情”<sup>12)</sup>。

9) 見1929年6月5日《申報》。

10) <蘇雪林 袁昌英 林宝權 吳續新 白薇 方于啓事>，1929年6月28日《申報》。

11) 張立英編的女作家叢刊，上海開華書局出版。內有《女作家隨筆選》(1933年10月初版)，《女作家小品選》(1933年10月初版)，《女作家散文選》(1933年12月初版)，《女作家日記選》(1933年12月初版)，《女作家書信選》(1933年)等。

12) 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光華書局 1933年1月，第31頁。

丁玲在《小說月報》上所發表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一系列作品,因其大胆“描寫一切女作家所不敢描寫的一切女性的心理變態,和男女間的所發生的關係與現象及其他等等”,而取得相當的成功<sup>13)</sup>,”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sup>14)</sup> 丁玲出現后,她的作品“給人的趣味,給人的感動,把前一時期幾個女作家所有的愛好者興味與方向皆扭轉了.他們忽略了冰心,忽略了蘆隱…….”<sup>15)</sup>.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丁玲的出現當如石破天驚,一鳴驚人.

在承認丁玲感應時代,應時而出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商業化因素在丁玲成名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保駕護航的作用.

丁玲的成名首先得益于《小說月報》對她的刻意而隆重的推出.《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先后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時,每次都是編排在小說創作的頭條.《夢珂》發表時排在早在“五四”時期就已成名的作家郁達夫的小說《二詩人》之前,《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時排在此前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幻滅》的成名作家茅盾的《動搖》之前…….《小說月報》為一個不知名的作者連續發表小說,並且均排在重要位置,這既顯示了編者的慧眼獨具,也是編者基于對作家,作品的認識而在編輯活動中表現出的匠心.借助《小說月報》這一馳名全國的強勢媒體,依托編者在編排中所透露的無聲的但是明確的信息,丁玲脫穎而出,赫然出現在讀者面前,僅在作品發表的第一次傳播活動中就已然在文壇成功登泉,以致于上海編輯,出版界朋友多來向《小說月報》的主編叶聖陶打听丁玲的情況.

丁玲在《小說月報》閃亮登場后,小說集《在黑暗中》的出版所代表的文學的第二次傳播活動進一步鞏固了丁玲在當時文壇的地位.作為《小說月

13) 荔荔:《讀了〈從軍日記〉后的閑話》,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光華書局 1933年1月,第81頁.

14) 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光華書局 1933年1月,第31頁.

15) 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載1931年4月15日《文藝月刊》2卷4號,6月30日2卷5,6號合刊.

報》的主編，叶圣陶在編發了丁玲的幾篇小說后，又主動給丁玲寫信，建議她將發表過的小說合起來出本小說集，并表示他可以代為與書店交涉。在得到丁玲的同意后，經過叶圣陶斡旋，丁玲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10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叶圣陶在編發丁玲的小說時，尚不清楚丁玲是男是女，雖說名字是女性化的，很易讓人想到是一位女作家。《在黑暗中》出版后，“女作家”丁玲正式映入人們的眼帘，被人們稱道。錢杏邨在《〈在黑暗中〉——關於丁玲創作的考察》中，在對丁玲的創作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后，在文章后面的“附記”中寫了一段帶有明顯的廣告味道的文字：

《在黑暗中》收了作者的四篇小說，《夢珂》是寫女子職業問題，《莎菲女士的日記》寫性戀心理，《暑假中》以同性戀為描寫的對象，《阿毛姑娘》寫女性的物質欲望的發展及其打擊。……在技術方面，作者似長于性戀描寫，那種熱情的，沖動的，大胆的，性欲的，一切性愛描寫的技巧，實在是女作家中所少有的。<sup>16)</sup>

既介紹了小說集的基本內容，又指出了其在題材和技巧方面的特征。

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雜誌也不甘人后，對於《在黑暗中》更是不乏贊美的文字。九臯在書評中這樣寫道：

像一朵“荷花”般的潔白，一塵不染地直伸起來的文人，那便是女作家丁玲女士。女士年來所發表的創作——小說——多散見于《小說月報》上面，女士以其敏銳的感覺，清新的情調，和那靈活的藝術，其所作的作品，實可為中國新文壇上別開生命。真的，女士的作品足以引起大多數的注意與感動；而且博得多數人的贊嘆，觀止。<sup>17)</sup>

透過上述批評文字，我們可以感受到《在黑暗中》出版后在文壇引起的

---

16) 錢杏邨：《〈在黑暗中〉——關於丁玲創作的考察》，1929年1月1日《海風周報》第1期。

17) 九臯：《〈在黑暗中〉》(書評)，1930年5月1日《開明》第2卷第11號。

反響和震動。

借助作品的一次傳播和二次傳播，丁玲一躍而成爲全國知名的作家，甚至超越前輩冰心，廬隱等人。

除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外，丁玲的成功還得益於其小說題材的大膽和誘人。作爲一名女作家，其自身就易引起較多的關注，兩性關係也一直是“五四”後作家們樂於表現但又最易招人非議的<sup>18)</sup>，在當時，“性”雖不再是禁區，但依然是敏感區。在此背景下，丁玲以“女”作家的身份在作品中大膽地描寫其他女作家“所不敢描寫的一切女性的心理變態，和男女間的所發生的關係與現象及其他等等”<sup>19)</sup>，自然就格外引人注目，由此在文壇產生“炸彈”一樣的轟動效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時隔十幾年後，蘇青凭借《結婚十年》的走紅也是相同的因素作用的結果。透過當時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出時人在丁玲的作品中最看重和強調的，“作者似長於性戀描寫。那種熱情的，沖動的，大膽的，性欲的，一切性愛描寫的技巧，實在是女作家中所少有的。”<sup>20)</sup>

## II. “丁玲失蹤”引發的“丁玲熱”

在出版了《在黑暗中》以後，丁玲筆耕不輟，追隨時代，在1929至1933年，陸續出版了《自殺日記》，《韋護》，《一個女人》，《一個人的誕生》，《水》等作品集，一方面贏得了左翼文藝界的高度評價，被魯迅稱爲“我們最優秀的作家”<sup>21)</sup>，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關注和忌恨。國民黨特務

18) 這種例子在當時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章衣萍和張資平：章衣萍凭《情書一束》名利双收，但也招致不少物議，張資平凭婚戀小說走紅，却并不被進步文藝界認同。

19) 荔荔：《讀了〈從軍日記〉後的閑話》，收黃人影編《當代中國女作家論》，光華書局 1933年1月，第81頁。

20) 錢杏邨：《〈在黑暗中〉—關於丁玲創作的考察》，1929年1月1日《海風周報》第1期。

21) 見張永年：《魯迅訪問記》，1933年6月1日《文藝月報》第1卷第1期。

沈醉曾在後來回憶中說道：“那時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聯’成員，很活躍，也很紅，在讀者中，特別是一些進步青年讀者中間影響很大，所以國民黨很注意她，很恨她。”<sup>22)</sup>正是基于對丁玲的忌恨和對進步作家的迫害，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從而在社會上失蹤。

由于丁玲是著名的女作家，是左翼作家的優秀代表，因此，丁玲失蹤后，左翼文壇及進步文藝界組成“營救丁潘委員會”，發起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丁玲失蹤事件”成爲當時社會的一大熱點，經過媒体的多方報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社會各界對丁玲的普遍關注誘發商機，引發了丁玲作品的出版熱和圍繞丁玲的創作熱。

丁玲失蹤后，社會各界對丁玲的普遍關注誘發巨大的讀者市場，在丁玲活不見人，死不見尸的情形下，人們只能把對丁玲的怀念通過對其作品的購買和閱讀來加以體現。同時，丁玲作品的出版，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國民黨政權迫害進步作家的無聲抗議，也帶有進步的政治意義。正是基于經濟利益和政治意圖，丁玲的作品得以迅速出版。1933年6月，在丁玲失蹤僅僅一個月之后，她的長篇小說《母親》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同月，小說集《夜會》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在《夜會》廣告中打的就是“失蹤”牌，稱：“丁玲女士失蹤了，她留下給我們的婉約的作風，奔放于紙上的熱烈的情感，真是抓住每個時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奮起的，本集是她失蹤前的最終的近作。”1933年12月，丁玲的朋友蓬子編選的《丁玲選集》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與此同時，丁玲以前出版的作品集也紛紛再版。

在丁玲作品的出版熱中，《母親》的出版最具典型意義。

《母親》是丁玲爲《大陸新聞》連載而創作的長篇小說，因《大陸新聞》的被禁，僅發表了第一章的大半，作家的創作也因此中斷，直到良友公司計劃《良友文藝叢書》請丁玲撰稿，《母親》方才繼續寫下去，至丁玲失蹤，《母親》尙未完稿。

作者被捕后三天，鄭伯奇上班后就找到《良友文藝叢書》的編輯趙家

22) 沈醉：〈沈醉的回憶〉，轉引自王增如：《無奈的涅槃 丁玲最後的日子》，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第144頁。



璧，對他說：“魯迅先生建議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長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寫個編者按作個交代。書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時要在各大報上大登廣告，大事宣傳，這也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種鬥爭方式！”<sup>23)</sup>《母親》出版時在《時事新報》和《申報》刊登了大幅廣告，同時也在《文學》，《現代》等大型文學雜誌上刊登了廣告。《文學》上刊登的廣告稱：

《母親》的獨特的异彩便是表現了“前一代女性”怎樣堅苦地在“寂寞中掙扎”，也許將來還有作品把這樣“前一代女性”的掙扎為題材，而且比《母親》寫得更好，但在現今，我們不能不把這部《母親》作為前一代女性怎樣從封建勢力的重壓下掙扎出來，怎樣憧憬着光明的未來——這一串酸辛的然而壯烈的故事的“紀念碑”看了。

這則廣告由茅盾親自撰寫，字里行間流露着對丁玲的怀念。《母親》出版時，為了造成更大的轟動，出版方還和國民黨反動派開了個玩笑——發售作者親筆簽名本，“簽名本一搶而光”<sup>24)</sup>。由於書店有效的宣傳，策劃，“《母親》出版后，立刻成為《良友文學叢書》中的最暢銷書。第一版印四千冊，一個月銷光，十月和十二月各再版二千冊，這在當時書業界簡直是個奇蹟。”<sup>25)</sup>《母親》的出現在當時既是成功的商業行為，又充分發揮了文學的戰鬥作用，它的出版本身，就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種無聲抗議，以作品的出版抗議作家的“失蹤”。

在丁玲作品的出版出現熱潮的同時，圍繞丁玲的紀念活動也是如火如

23) 趙家璧：《丁玲的〈母親〉是怎樣出版的？》，見趙家璧：《編輯憶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4年8月第1版。

24) 趙家璧：《丁玲的〈母親〉是怎樣出版的？》，見趙家璧：《編輯憶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8月第1版。關於簽名本，具體情形是：“原來我們和作者簽訂約稿時，就交他一百張編號而空白的簽名紙，簽好后先交給我們保存，一待出書裝訂時，就把這一百張紙，作為里封襯頁，裱在一百冊布面精裝封面的背后，這樣就成了作者簽名本。”

25) 趙家璧：《重見丁玲話當年——〈母親〉出版的前前后后》，見趙家璧：《編輯憶舊》，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1984年8月第1版，第87頁。

茶，甚至出現了圍繞丁玲的創作熱。在創作熱中，出現了大量的關於丁玲的紀念文章和評論文章，如茅盾的《女作家丁玲》<sup>26)</sup>，陳北鷗的《悼丁玲》，林銜的《評丁玲〈奔〉》，季羨林的《夜會》(書評)，王淑明的《母親》(書評)，錢杏邨的《關於〈母親〉》，等等。北平的北方“左聯”的機關刊物《文學雜誌》甚至還出版了紀念專号，除刊發了雪野的《紀念丁玲》和峰毅的《丁玲胡也頻在濟南》等紀念文章外，還在“畫頁”欄刊發了女作家丁玲像，丁玲手稿，丁玲的愛兒，丁玲畫像。媒体對丁玲的關注一方面部分滿足了讀者對丁玲失踪后了解的渴望，同時又進一步刺激和吸引讀者對作家的更深入的了解。讀者的渴求催生了相關的作品產生，沈從文的長篇傳記《記丁玲》應運而生。《記丁玲》先是在天津的《國聞周報》上連載，后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單行本。《記丁玲》的廣告稱：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說只有作者沈從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書從丁玲的故鄉和她的父母寫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筆，把一個沖破了舊家庭束縛到大都市里來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現在讀者的眼前，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完美的傳記文學。

以作家的摯友的身份來為丁玲作傳，這樣的傳記內容無疑是相當誘惑人的，更何況“他把對一個熟人的回憶當小說寫。他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也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sup>27)</sup> 這樣的傳記自然就更有吸引力，同時也更有市場了。在肯定作家創作這部作品的文學動机的同時，我們也不應漠視潛伏于文學動机背后的市場因素。同樣基于市場因素，立達書局出版了張惟夫著的《記丁玲女士》。<sup>28)</sup>

丁玲失踪后形成的丁玲熱形成一種社會輿論，施加影響于國民黨當局。

26) 該文最初發表于 1933年6月19日 《中國論壇》 第2卷第7期；后又刊于同年7月15日 《文藝月報》 第1卷第2期。

27) 徐小玉整理：〈徐霞村訪談錄〉，《新文學史料》 1999年第2期。

28) 除沈從文的《記丁玲》和張惟夫的《記丁玲女士》外，据徐霞村回憶，“丁玲被捕后，王森然寫過一本關於丁玲的書”(見《徐霞村訪談錄》)，只是該書尚未找到。

正是迫于社會的輿論壓力，加之多方營救，以及作家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丁玲在失蹤后才得以幸免于難，沒有慘遭殺害<sup>29)</sup>。

在商業化的環境中，女作家作為一個獨特的存在，較之男性作家有着更多的性別優勢。從文學的生產和傳播來看，女作家因其稀少，其作品易受到市場的青睞，作家本人也易受到文壇的追捧，因而在文壇相對容易登龍。雖然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的確立不是按性別，主要還是靠作品說話，既然女作家在文學生產和傳播環節已經占先，自然她們也就贏得了優先說話的權力。

### <參考文獻>

- 丁玲，《丁玲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  
趙家璧，《編輯憶舊》(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84.8  
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海光華書局)，1933.1  
章克標，《章克標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12

---

29) 關於丁玲被捕後沒有慘遭殺害的原因，沈醉是這樣解釋的：“我堅持是由于您相當有名(不是您所說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除了許多人出面援救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您是一個女青年作家，這樣就很多人同情您，……還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對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隨便殺害，是有八個字的原則的，即怕：‘社會輿論，國際影響。’” 見沈醉：《給丁玲的信》，轉引自王增如：《無奈的涅槃 丁玲最後的日子》，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第142頁。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visual angl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akes Dingling as a representative,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pecial status and position of the author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literature's production and propagation.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states that the popularity of Dingling in the 30s is the synthetical result of her sexual advantage, unique style, media package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olitical factor.

Key words : industrialization, authoress, Dingling